陕西工人报

报告文学 散文征文 双鸭林

（报告文学）

小站的婚礼变迁

罗宗华

1978年初夏，我从“农业大学”毕业，实现了当一名铁路工人的夙愿。没想到走对了路，却进错了门。一张纸便把我甩到阳安线上的一个四等小站，即被段机关干部文诌诌地称为阳安线上“第三监狱”的茶镇火车站。

和我一块儿分到这个站上养路工区的还有三个伙伴。一下轨道车，一位被大家称为工长的人把我们安置在一间油毛毡搭盖的临时房里。由于刚入路，心情比较激动，所以到天黑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房内竟然没有电灯线。我们找到工长，“小伙子们，有口福呵。今天工区王班长结婚，咱们先去吃喜糖。桅灯已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四人一盏灯，每月定量是两斤油。”听完工长的话，我们凉透了：“这样的条件还不如我们插队的农村呢！”

走出工长的家，就听到车站东边传来的阵阵粗犷的笑声。跨进养路工区的院子，只见一盏汽灯挂在洞房中间，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把靠院角的一间小屋围得水泄不通。不仅年轻人在这里嬉笑打闹，几个奶头子拖至裤腰的职工家属，竟然也豁开衣服，在人堆中起哄。透过被撕破的红窗纸，我看到炽白灯光下，新郎和新娘被团团围住，一会儿身不由己地互相碰头，一会儿被分割开来挤挤撞撞。不一会儿工夫，新娘就被抹起了鼻子。最后，是工长和一位大嫂使出浑身力气把新娘“抢”进另一间房子，用大锁把门锁牢。想不到几个小伙子又端来一张桌子，狂笑着对着窗户往里撒尿。

当晚，我们灯也没点，静静地围坐在一起，不知谁先抽泣起来，惹得我们四个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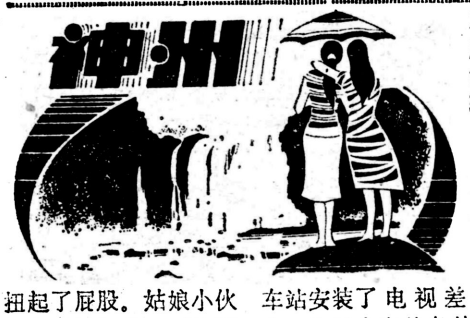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与一位老工人谈及此事，他严肃地说：“除了上班，没事干，闷得慌呗！清早扛着捣镐上班，下班吃饭喝酒聊天，这就是小站的娱乐，好不容易遇上要媳妇，不闹，干啥？你看我们结过婚的老工人，那个不是‘半脱产’（老婆是家属）昨天结婚的王班长，30岁了，才找了个村姑。”我的心阵阵隐痛。

后来，因为我在铁路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工区轶事，被抽到分局政治部驻勤，干了三个月，领导们认为我诚实、恳苦，组织部一张纸，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养路工一下子成了分局政治部的秘书。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决定，加上我又成了家，一晃过去了好几年。86年我专程到茶镇去看“哥们儿”。一块儿进工区的，现在都当上了工长、领工员以上的“官”。原来的临时房屋已变成了二层楼。79年底全站区都拉上了电灯线。而且站区已有了自来水管。巧得很，这次来又赶上养路工区一职工结婚。新娘就是站区桥隊工区的桥隊工。来到挂满喜联的新房，冰箱、洗衣机、组合家具，全部现代化。洞房里，“仪式”开始了。身穿西服的新郎新娘向客人鞠躬行礼后，向大伙散发了苹果、糖块。当两人大大方方地谈完恋爱经过后，众人又追问新娘为什么爱新郎，她脸上飞起两朵红晕，脆生生地说“人家是新长征突击手呗！”哄笑声一起，几个小伙又企图推推搡搡，被主持人制止了。接着，有人提议让新娘新郎来一段迪斯科。随着录音机播放的舞曲，新娘新郎扭起了屁股。姑娘小伙们也随着舞曲，不约而同地扭了起来……

一晃，两年又过去了。这两年，分局又先后投资近千万元改善职工福利设施。为管内71个站区修建了文化活动室，配置了图书及各种文娱活动用品。为24个车站安装了电视差转台，为20个自然条件比较差的站区安装地面卫星接收天线。大站区还安装了闭路电视。

哦，小站，短短十年，你变了。小站职工，不仅有20吋的大彩电，一些职工还买了录放机。



本版编辑 杨乾坤

京娘、陶三春与忌讳

李文举

商洛山中多故事。一座山，一条水，这地名，那古树，都能被山民们说出个样样行行来。阎王爷在生龙寨娶妻生子啦，邵雍手植大叶柳啦，苏娘娘高楼梳洗啦，等等，有时间，有地点，情节离奇，绘声绘色，听之真能使“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但若实地察考，失望者居多，看景不如听景嘛！

有一山街，叫清油河，流传着“赵匡胤千里送京娘”与“三打陶三春”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本不足为奇，我国的地方戏曲中大多都有。然而出奇的是，这里一带人认定京娘与陶三春的娘家就在清油河，自然，他们都是娘家人了。娘家人嘛，自然须庄重、严肃。对于自家的姑娘与他人自由恋爱的事不愿见，也不愿闻。于是这一带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习俗，“为京娘，陶三春讳”。有一戏班忘却了“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入门问讳”的古训，来此上演了《送京娘》与《打瓜园》，不等戏完，触犯了众怒，一阵乱棍给打跑了。

诸好此类的忌讳，在其它地方也有。姓潘的户族不看《翠屏山》与《潘金莲》；王家庄不许演《王大娘钉缸》；天津蓟县颜家村一带不做关公，因为他们的先祖颜良为关羽所斩。由此我又联想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忌讳：出门时，择三、六、九；饭桌上只能说吃好、吃饱，不能说吃完、吃了；走路时讲究低头妇人扬头汉；妇女不准骑骡子，因为骡子不生育；死了人不能给穿瞎子，因与“断子”谐音。至于各个朝代以及“文革”中政治避讳，更多如恒河沙数，一语不慎，动辄得咎，会招来灭顶之灾。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其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禁忌避讳等观念意识，积淀得太厚太多，这如同一种无声的命令，指挥着世代人们按一定规范行事，“习俗移人，贤者难免”。然而一些本属落后、愚昧甚或荒诞无稽的忌讳，人们还要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它，宣扬它，而且世代相袭，极其稳定。其结果，思想禁锢，社会停滞。悲哉也夫！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这是我们的先哲老子在两千年前讲的一句名言。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中国，象春潮溢满的清潭，改革、开放的闸门已开，欢腾的瀑布正在飞泻而下，人们头脑中各种陈旧、迂腐的观念正在被涤荡、冲洗。我想京娘、陶三春娘家人的忌讳意识，也应在洗刷之列。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及七大军区主要领导人

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迟浩田
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
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
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
政委：刘振华
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
政委：宋克达
广州军区司令员：张万年
政委：张仲先
济南军区司令员：李九龙
政委：宋清渭
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
政委：万海峰
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
政委：李宣化
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
政委：傅奎清（舒畅辑）

崂山游

答养力

奇山华秀黄海边，
翠幻眺瀛州飘缈间。
涌松涛山呼啸响，
碧连九霄海岳峦；
天欲坠蟠桃岭；
石枝摇荫太清园；
古卧偕风峰顶醉，
崂山雾作浪中颠。

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

·林杉·

“我们对不起张汉卿”

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张学良以为获释有望，心情为之一畅。这时，国内许多爱国人士、民主党派认为为了推动全国一致抗日的张学良至今仍系牢笼实属不公，纷纷要求释张。但是蒋介石的回答是：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父子关系。他囚禁张学良是爱张学良。1946年元月，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周鲸文曾以民主同盟的立场再次提出张学良的问题。周恩来同志随后又在会上正式要求释放张、杨二将军，但均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947年元旦，南京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及“大赦令”，周鲸文、莫德惠等东北籍著名人士，再一次向蒋请愿，认为张学良已被“管束”十年，应予以恢复自由。但“大赦令”中仍找不到张学良的名字。

其实，早在1946年11月，张学良已被遣送到台湾，住在新竹园竹东镇原是日占时警察局招待所的井上温泉。当时戴笠已死。蒋介石指示保密局（前身为军统局）：“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刘乙光对张学良诡称，委员长有电报来，送他到南京去。张学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到重庆后，刘乙光认为张学良身边的那个副官是张的心腹，不能再去台湾，乃设词把他留下，从此，张学良身边除赵四小姐外再没有一个亲人了。等到飞机把他送到台湾时，张学良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1947年5月，莫德惠奉准再次探望张学良，张表示了他想到大学教明史或到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当研究员的愿望，并送莫一首五言绝句：“十载无多病，故人多未疏。余生烽火后，唯一愿读书。”此时，内战迭起，张学良恢复自由更加无望，刘乙光“看守有功”，已由中校升为少将，狗眼看人，对张学良态度更加恶劣，使张无法忍受。恰在这年10月，刘乙光老婆住院，要求请假一月照料病人，保密局考虑到张严佛（该局设计委员主任）和张的关系还好，就派他到台，一面考察看管，一面缓和一下关系。见面后张学良一字一泪地哭诉了自己十几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继戴后的保密局长），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还说到在台湾二·二八事件时，刘乙光整天恶狠狠地盯着他，指挥宪兵特务昼夜不停地在屋子周围巡逻，并对室内严密监视。刘的部下有人偷偷告诉他，刘乙光准备在局势不可收拾时，把他和赵四小姐在混乱中打死，对上面则报告台湾乱民所为。“不是闹事在几天内结束，真难说咱们还能在这里见面。”

同月，张治中携家人到台渡假。当时的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张治中的学生，在张的要求下，彭勉强同意张治中去访张学良。这是张学良被囚禁后张治中的第三次来访。两位老朋友谈得很痛快。张学良叙述了希望恢复自由的心情。张治中安慰他说，一旦国共两党和谈成功，便是他恢复自由之时。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并托他向蒋介石和宋美龄提了两点要求：第一点，希望早一点恢复自由。恢复自由后，哪里也不去，也不一定工作，蒋可以先考察他一个时期再说。第二个请求是，他希望刘乙光搬出他的房子，他的生活由自己管理，以保持清静。临行，张学良写诗一首赠张治中：总府远来意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回到南京后，张治中向蒋介石报告了看望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的请求。蒋介石听后很不高兴，不置一辞。张治中又向宋美龄转达了张学良的话。宋美龄说：“我们对不起张汉卿，他的第一件要求不容易做到，第二点我想办法一定做到。”一句“对不起”，道出了这一千古奇冤的真情，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真象，多少不便明言的曲衷也尽在此言中了。蒋介石对张治中看望张学良非常不满，曾下手谕以后不经他亲自批准，任何人不许见张学良。

（五）

张学良与赵一荻合影（一九八三年）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5号 本报邮政编码：710005 办公室、广告组电话：710619 一编室电话：27708 二编室电话：22227转 群工部52728 陕西日报印刷厂代印